

经济学家怎会错得这样离谱？

■ 保罗·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名声大噪。

析，他认为“带有较为保守的指导意义”。凯恩斯是希望修补资本主义制度，而非取而代之。不过他的确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在没有看护人的情况下正常运转的观念，尤其是对金融市场表达了蔑视，他认为这个市场被短线的投机所操控，很少顾及基本面。于是他呼吁用积极的政府干预——印刷更多的钞票，以及在必要时大量投资于公共工程——来应对衰退期的失业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凯恩斯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提出大胆的主张，他的《通论》是本带有深刻见解的著作，其中的分析折服了当时那些最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然而，过去半个世纪来的经济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在讲述一个从凯恩斯主义的立场撤退，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故事。新古典的复苏最开始起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1953年，他就断言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描述“既能结出极其丰硕的成果，又值得完全的信任”。只是关于经济萧条的问题呢？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的反击始自所谓的货币学派理论。货币学派在原则上并不否认市场经济需要有意识的调节，例如弗里德曼就曾说过，“我们如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当然他后来声明这句话不能断章取义地理解）。不过这个学派却强调说，要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采取些非常有限的政府干预形式就足够了，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中央银行的操作来使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保持稳定增长。一个很著名的论点是，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安娜·施瓦茨提出，假如美联储的工作做得足够好，大萧条本来就不可能发生。弗里德曼“自然水平”（在目前反对美国被认为4.8%左右）之下的任何有意而为之的努力；他预测说，过度的经济扩张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同时降临——这一预测被1970年代的滞胀所证实，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声望。

但最后，反凯恩斯主义运动却远远超出了弗里德曼本人的立场，与其继承人的言论相比，弗里德曼的观点甚至会显得相对很温和。

在金融学家们那里，凯恩斯将金融市场视为“赌场”的轻蔑被“有效市场”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声称，金融市场对资产的定价总是真实地反映着既有的信息。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衰退的时候也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的框架。有的人回到熊彼特及其他大萧条的辩护者的立场，把萧条理解为好事，是经济体为了适应变化所做的调整的一部分。即使是那些不愿意走得过于极端的人也认为，对抗经济衰退的任何尝试所起的作用都会弊大于利。不是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愿意走上这条道路：许多人成了自诩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仍然相信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他们也都接受了投资者和消费者是理性的、市场通常能正常运转的看法。

当然，潮流中还是有另类出现：部分经济学家挑战了理性行为的假设，对金融市场值得信任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指出金融危机有着漫长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不良记录。只是这些人在逆流而动，无法扭转当时泛滥成灾、如今看来却十分愚蠢的自满情绪。

三、过分骄傲的金融学

在1930年代，出于显然的原因，金融学的名声并不好。凯恩斯将其类比为“在报纸举办的竞赛中，参赛者需要从一百张照片中挑选出六张最漂亮的脸孔，优胜奖将授予与参赛者总体的平均偏好最接近的选手；于是，每位参赛者应该选择的就不再是他本人以为最漂亮的脸孔，而是他猜想其他参赛者最有可能喜欢的脸孔”。

凯恩斯认为，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中把时间花在追逐其他人的时髦选择上，因此让这样的市场来决定重要的商业决策会很糟糕的想法：“当某个国家的资本投资成为赌博活动的副产品之后，这样的工作肯定做不好”。可是到1970年代前后，有关金融市场的研究却似乎被伏尔泰笔下的潘洛罗斯博士所支配了，这位博士坚持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个。有关投资人的非理性、泡沫、破坏性投机的讨论在学术界完全消失，这个学科被“有效市场假说”所统治，其含义是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完全是公众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反映出来的内在价值，其发布者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例如，给定某公司的盈利水平、商业前景等各种内容的相关信息，股票价格总能准确反映该公司的价值。到1980年代，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为代表的金融学家们又提出，由于金融市场总是能正确地定价，因此，公司领导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经济）就应该使使自己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大化。换句话说，金融学家们相信，它们应该将一个国家的资本运转交到凯恩斯所比喻的“赌场”的手中。

很难说经济学研究出现的这一趋势变化是由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的确，对于1929年的记忆在逐渐消退，但牛市依然不断出现，过度投机的传说盛行，然后又是熊市的到来。例如在1973—1974年，股票价格曾下跌了48%。而在1987年的股灾中，道琼斯指数又因为不明所以的缘故在一天之内下挫了近

23%，这些事件本来应该使人们对市场的理性产生某些疑虑。

但事实上，这些凯恩斯或许会认为能证明市场的不可靠的重大事件，却丝毫没有弱化一个优美的理论观念产生的巨大力量。金融学家们在每个理论都会产生性地平衡风险与回报的假设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理论模型，也就是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非常精美，而且假如你接受其假定，这个模型的用途也会极其广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能告诉你该如何选择投资组合，而且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告诉你该如何对衍生产品（对收益权的权利）定价。这个新理论的优美特征和显著的实用性给其创立者们带来了一系列诺贝尔奖，该理论的许多专家还获得了众多较为世俗的奖励：借助新的模型和强大的数学技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更高级应用需要物理学家层级的运算能力——温文尔雅的商学院教授们得以跻身华尔街的高级技术人员之列，也拿到了华尔街层级的薪酬。

公正地说，金融学的理论家们并不仅仅是由于其优美、实用和回报丰厚而接受有效市场假说，他们也提供了大量的统计分析的证据。这些证据初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但实际上内容却非常有限。金融学家们很少会问那些看上去非常浅显其实却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某项资产的价格相对于盈利水平等真实经济的基本面数据是否有参考意义。相反，他们只会考虑，相对于其他资产的价格，某项资产的价格是否有参考意义。如今已成为奥巴马政府主要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曾经用“调味番茄酱”的寓言来揶揄金融学，说他恰好“证明了一夸脱的调味番茄酱的销售价格恰是一夸脱的调味番茄酱的两倍”，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调味番茄酱的市场具有完美的效率。

不过，无论是这样的嘲讽还是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等经济学家所做的更有礼貌的批评，都未能产生足够的影响。金融学的理论家们继续坚信自己的理论在本质上是对的，许多作实际经济决策的人同样如此，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文伦·格林斯潘，他在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放松金融监管的支持者，他之所以拒绝限制次级贷款和控制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自现代金融学对市场一切尽在掌握的迷信。2005年发生过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在庆祝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任职的研讨会上，某位勇敢的、名为拉古拉迈·拉詹（令人惊讶的是他也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来宾提交了一篇带有警告性的文章，说当时的金融体系已接近危险的风险水平，却遭到了几乎所有在场人士的嘲笑。顺便说一句，其中包括萨默斯，他说拉詹的警告都是“误导”。

然而到2008年10月，格林斯潘却承认他陷入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之中，因为原有的“整个理论大厦”都已“坍塌”。由于这一理论大厦的坍塌同时伴随着真实市场的崩溃，结果自然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许多指标上看，我们目前遇到的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衰退。政策制定者们该如何行动呢？不幸的是，宏观经济学自身也陷入了迷惘。

到来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资本主义视为完美或接近完美的经济体系，这样的观念在大规模失业现象面前难以维系。可是随着大萧条的记忆逐渐淡去，经济学家们又重新坠入古老的理想化的经济体的情网，在那种理想化的经济体系中，理性的个人在完美的市场中相互作用，只不过这次多了些神奇的方程式作粉饰。可以确信，与理想化的市场经济破镜重圆，部分原因来自政治风向的调整，部分原因来自经济利益的刺激。当然，尽管胡佛研究所资助的学术假期和华尔街提供的工作机会都不可小视，但经济学研究遭遇失败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这个领域过于强调无所不包的、追求精美的方法，过于希望给学者们提供炫耀自己数学天赋的机会。

不幸的是，这种高度浪漫和提纯的经济观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所有可能出现偏差的问题。对于经常带来泡沫和崩溃的人类理性的局限，对于失控的制度性缺失，对于可能给经济运行系统带来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冲击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缺陷，对于监管者自己缺乏监管的信心时会产生的危险，他们全都闭上了双眼。

要判断经济学家这个行当将走向何方，则是个难以预测的课题。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学家们将必须努力适应混乱不堪的局面，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承认非理性的、经常属于不可预测的行为的重要性，不得不直面市场中经常出现的特定的不完善，不得不接受精巧的“大一统”经济学还在天边的现实。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这将意味着对于经济政策的建议会更加谨慎——并且取消出于市场自利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而取消各种安全机制的愿望。

二、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再回潮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通常要归功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发表的《国富论》。在接下来的160年间，经济学理论体系蓬勃发展起来，其核心思想是：相信市场。经济学家们固然也承认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外部性”，其含义是指某些人的行为给其他人造成了负担，却并不需要为此付钱，例如交通阻塞或者环境污染等。然而，“新古典经济学”（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后期那些把“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提升为精炼的理论的学者）的基本假设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市场体制充满信心。

不过，这样的信心却被大萧条给粉碎了。当然，即便是面对全盘崩溃的局势，仍然有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例如，约瑟夫·熊彼特在1934年（那是什么年代！）还宣称，“萧条不能被简单地当成坏事”，而是“某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的表现形式”。但当时的许多（最后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却接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看法，去寻求对当时现实的解释和未来衰退的解决办法。

可能与你听说的不同，凯恩斯并不希望由政府来负责经济的运营。对他在1936年发表的杰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做的分

中国军魂铸就的经济学家群体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国防经济学总论》（长征出版社1986年版）等学术著作。这些作者对我而言，真可谓“闻名已久，未得一相逢”。1987年，随着《军事经济研究》（当时是季刊）杂志的创办，又有一些“学术人物”跃入我的眼帘，曹智英的《论军事经济效益》（《军事经济研究》1987年1期）、周建设的《国防费分析》（《军事经济研究》1987年3期）、朱庆林的《试论军力有机构成原理及其意义》（《军事经济研究》1987年4期）等。正因如此，我才关注“国防经济学”，关注那些长期从事国防经济学研究的人物。

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激发的学习热情异常高涨。那个年代是第一代国防经济学人拓荒的年代，是国防经济学人光荣与梦想放飞的年代。除了《经济研究》、《经济动态》偶尔发表极少量国防专门论文外，《解放军报》和《世界经济导报》专门开辟“国防经济”专栏，《经济学家周报》也刊载过国防经济方面的文章。

1988年7月，我参加了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与国防大学共同举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防经济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参加参会的是宋振铎同志，这是我接触穿军装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参加会议的基本都是军队同志，库桂生、樊崇高、刘义昌、张振东、顾建一、李怀信、唐大德、孙柏林、曹智英、朱庆林、李霖、戴礼刚等学界精英悉数参会，我作为年龄最小的参会者，对这些学者风范感触至深。那时候，库桂生是副师职研究员，谈吐风雅，待人谦和；樊崇高是副营职教员，三十出头，意气风发，风流儒雅；顾建一在39集团军仓库代职，当管理处长，温文尔雅；刘义昌是军科的研究员，能言善道。1990年

10月，我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军事经济研究中心第三届年会，除了部分老面孔外，增添了几个新人物，像海军指挥学院的陈严、海军勤务学院的陈炳福等。这些“经济学家”生龙活虎，年轻气盛，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文字泼辣，一腔热血，思维超前，都有报效国家的理想志向。短暂的接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我回忆起来，仿佛还在昨天。

遗憾的是，这个“国防经济学人”集体，岗位特殊，圈外人知道得不多。他们在军队默默奉献，为我国国防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到地方工作后，还专门约请库桂生、顾建一等同志为《市场经济研究》的“国防经济”专栏撰写文章，还刊发过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刘青松同志撰写的军事经济文章。我与这些同志相识30载，也关注了他们30载。这里，我就所知晓的人物作简要介绍。

库桂生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教授，历任海军某舰副政委，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国防大学副教育长、教研部主任等职。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国防经济学教研工作，是新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开拓者之一。在国防经济学基本理论、国防经济学说史、中国国防经济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并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他与宋振铎的《国防经济学概论》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国防经济学专著，他主编的《国民经济动员》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经济动员的理论著作。他潜心研究，勇于探索的精神始终值得我们学习。

人的模范。他退休不褪色，雷厉风行，领衔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防务前沿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继续从事国防经济前沿探索。

顾建一最早在66军服役，1978年到解放军后勤学院，当过军事经济教研室主任，是国防经济学带头人。他立足实践，求真务实，致力国防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学术成果丰富。同时，他还先后参加军队预算改革等专题的研究论证及《国防法》等重要立法的研究工作，是注重宏观与微观结合，以服务军队改革实践著称的国防经济学家。

姜鲁鸣曾是甘肃临夏驻军部队的一名电影放映员，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5年分配到国防大学任教。姜鲁鸣作为军民融合发展研究的先行者和国防经济研究的领军人物，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集体授课。他历史著书，勤于积累，铸就了《中国国防经济史》、《国防预算制度的创新》、《中国近现代国防经济史（1840—2009）》等学术精品。

陈炳福于1985年江西财经学院毕业后入伍的，现任海军工程大学勤务学院教授。他倾注于军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见解独到，有开拓性贡献。尤其是在国内首次提出中国军费发展的适度滞后战略和适度防务负担区间理论问题，被决策层和学术界广泛接受。我与陈炳福一见如故，他做事低调，工作谨慎，不爱张扬，比较谦虚。

朱庆林于1969年参军入伍，提干后历任排长、连队指导员等。他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到军事经济学院任教，长期从事国防经济理论特别是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是国民经济动员学科带头人。

武希志是1973年入伍到军事科学院的，后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读书，毕业后到军事科学院出版社当四年编辑，1987年在军制部工作，主要从事国防经济和国防动员研究。由于对科研事业的执着和不懈探索，他的学术成果屡有突破屡有创新，建树颇多。

此外，还有杜人淮、方正起、卢周来、谢茜等。以上“国防经济学人”，他们成长在军营，学术造诣，以穿军装、戴军帽、锐意创新、牢记宗旨、追求卓越的可贵品质书写了国防经济学科的辉煌，是影响中国国防建设的经济学家。

这里提到经济学家群体，参加过新四军的老经济学家居多，当过战士的居多，有“民参军”的也有“军转民”的，也有在军营成长起来的，“军民融合”的意味十分浓厚。这群老兵，可谓兵种齐全：傅和平是炮兵，刘树杰是空降兵，王广谦是警卫、金碛是航空兵、黄泰岩是坦克兵、王松奇是潜水兵、胡汝银是通信兵、陈晓和是工兵。王志华是作训科长，库桂生是舰艇副政委，樊崇高是空军，姜鲁鸣曾是电影放映员、谢茜是武警……现在，尽管他们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高校的校长，有的是高层智囊，有的成为将军，但当兵的经历对于他们既是骄傲的，更是无法忘怀的。杜润生下去搞调研必带地图——这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习惯，顾建的“行军床”，黄泰岩的“人在旗在、人不在旗还在”，温铁军的“懂得了士兵”，姜鲁鸣的“做一个报效祖国的学者，这是军人的天职，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对自己的军旅生涯，一生无悔。这种精神和信仰必将伴随他们的学术人生到永远——军魂永驻。（完）

▶▶▶ [上接 02版]

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下王志华，因为他仅仅是一个初中学历，没有学术职称的“草根”学者。我与王志华1992年相识，被他的探索精神和取得的学术成就深深感染。他从军20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作训科长。从1978—1986年先后八年中越边境战争中度过，参加和参与指挥战役战斗数十次，在战争环境和军旅生活中磨练了坚强的意志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造就了独特的思维方式。他长期坚持刻苦攻读和业余学术研究，涉猎经济学科，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有较深的造诣。他的《大系统价值学说》（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出版）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学专著，得到蔡继明、邹东涛、晏智杰等著名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三、在军营中成长的经济学家

在军营中成长的经济学家，他们是穿军装的经济学家——国防（军事）经济学家。这部分专家学者人数不多，我熟悉的主要都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国防经济研究的拓荒者。

我最早接触“国防经济”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86年看到的几篇文章：金朱德的《国防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解放军报》1986年5月16日）、库桂生的《关于制约国防费结构的两个因素》（《解放军报》1986年12月24日）、樊崇高的《社会主义国防商品生产的若干问题》（《经济研究》1985年12期）、刘义昌的《国外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向及措施》（《外国军事学术》1986年3期）等。不久，我又看到了宋振铎、库桂生著的《国防经济学概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孙柏林的《中国